

加入欧盟二十周年：入盟红利从何而来？*

马克西姆·丘皮尔金^{id}，科恰恩·佐卡^{id}，亚历山大·普列汉诺夫^{id}

2024年标志着十个经济体加入欧盟二十周年。这些经济体的经验以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为特征。在2003年至2023年期间，EU-10与德国之间观察到的平均趋同幅度为23个百分点，其中6个百分点与具有相似特征的其他新兴市场共有，而其余17个百分点可被视为“欧盟入盟红利”。这一红利得以实现，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在深度融入供应链的过程中，出口相对于GDP实现了快速增长。考察更早一轮欧盟扩大的影响，在入盟二十年后，我们同样估计西班牙和葡萄牙（1986年加入欧盟）获得了显著的“欧盟入盟红利”。奥地利、芬兰和瑞典（1995年加入欧盟）只有在更长时期内、且在对照组排除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这些虽非欧盟成员但可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经济体的情况下，才表现出优于其合成对照的结果。

《经济文献杂志》（JEL）编码：F15，F43，F63，O47

关键词：欧盟；入盟红利；收入趋同；贸易一体化

一，引言

2024年5月1日标志着十个经济体加入欧洲联盟（EU）二十周年：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随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于2007年加入，克罗地亚于2013年加入。本研究考察了这些经济体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经验，并将其与更早几轮入盟国家的经验进行比较，尤其是奥地利、芬兰和瑞典（1995年加入），西班牙和葡萄牙（1986年加入），以及希腊（1981年加入）。

我们采用合成控制法来估计“欧盟入盟红利”，即超出单纯基于收入趋同带动的、由加入欧盟带来的超额收益。具体而言，我们使用一组未加入欧盟的国家构建一个合成对照组，使其在入盟前的特征与加入欧盟的国家相似。随后，我们将这一“反事实”国家的后续经济演变与实际加入欧盟国家的经济表现进行比较。尽管欧盟扩员并非随机事件（存在我们无法控制的变量选择偏差），因此我们的估计结果不能被严格解释为因果关系，但分析中

*所刊文章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匈牙利国家银行的官方主张。

马克西姆·丘皮尔金（Maxim Chupilkin）：牛津大学，博士研究生；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助理经济学家。电子信箱：chupilkm@ebrd.com

科恰恩·佐卡（Zsóka Kóczán）：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副总监兼主任经济学家。电子信箱：KoczanZ@ebrd.com

亚历山大·普列汉诺夫（Alexander Plekhanov）：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总监。电子信箱：plekhana@ebrd.com

本文部分内容基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2024）中所呈现的分析。

本文载于《金融与经济评论》2025年3月刊。<https://doi.org/10.33893/FER.24.1.52>

呈现出的若干事实特征，包括不同入盟年份国家之间经验的异质性，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们的分析基于Abadie和Gardeazabal（2003）提出的合成控制方法，并与Campos等（2019）的研究关联最为紧密。后者研究了1973年至2004年欧盟扩员的影响，但所考察的入盟后时间跨度更短。

总体而言，我们的结果表明，在入盟时收入水平较低、制度较弱的经济体，获得了显著且持久的趋同红利；而对于在入盟时收入较高、制度较强的经济体，这种效应并不明显。

“欧盟入盟红利”——即超出单纯收入趋同所能解释的额外收益——在2004年入盟的经济体中，20年后约为17个百分点；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中约为33个百分点。奥地利、芬兰和瑞典只有在其合成对照组排除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这些虽不属于欧盟但可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经济体）时，才表现出优于对照组的结果。

如果入盟所带来的趋同提升在收入和制度差距较大的情况下最为显著，那么对于近期几轮入盟的许多经济体而言，其边际趋同空间目前已较为有限。另一方面，欧盟更广泛邻近地区的经济体（高加索地区、摩尔多瓦、南部和东部地中海地区、土耳其、乌克兰以及西巴尔干地区）仍可能从与欧盟持续深化的经济一体化中获得显著收益。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回顾有关欧盟入盟经济收益的实证文献；第三节介绍实证方法与数据；第四节按照入盟年份分组展示研究结果。第五节为结论。

二，文献综述

关于欧洲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早期文献认为，一体化对增长的作用主要通过贸易一体化发挥。Baldwin 和 Seghezza（1996）对相关证据进行了综述，发现欧洲一体化推动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是贸易一体化带来的效率提升所诱发的固定投资增加（另见 Slaughter，2001）。

尽管关于欧盟、单一市场以及欧元所带来的贸易自由化收益已有大量文献，但关于欧盟成员身份收益的计量经济学估计相对匮乏。正如 Boltho 和 Eichengreen（2008）以及 Campos 等（2019）所指出的，许多早期研究缺乏清晰的反事实设定。这些研究中的大多数也明确警告其结果稳健性欠佳。Henrekson 等（1997）估计，成员身份带来的收益约为每年0.6%至0.8%，但指出这些估计“并非完全稳健”（第1551页）。Badinger（2005）估计，“如果自1950年以来未发生一体化，欧盟的人均GDP今天将大约低五分之一”，但同时提醒该结果“并非完全稳健”（第50页）。Crespo Cuaresma 等（2008）发现欧盟成员身份对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但警告国家异质性仍是一个严重问题。Ben-David（1993，1996）将欧洲一体化视为推动人均收入趋同的重要机制。在其1993年的论文中，他得出结论认为，欧洲贸易一体化会降低收入离散度。为克服识别问题，Ben-David（1996）将“贸易一体化俱乐部”与在国家数量相同的条件下随机生成的其他俱乐部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只有贸易一体化俱乐部中才观察到趋同现象。相关文献还研究了不同制度在支持趋同中的作用（例如 Szapáry 和 Vonnák，2024，考察货币政策作用的研究）。

本研究与 Campos 等（2019）关系最为密切。该研究使用合成控制法，为1973–2004年间加入欧盟的国家构建反事实框架。研究发现欧盟成员身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而正向的影响，希腊是一个例外。总体而言，其估计结果表明，如果没有制度一体化，加入欧盟后的前十年内，欧洲人均收入平均将低约10%（另见 Campos 等，2022，关于1995年欧盟扩大的生产率效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4）的一项最新研究同样指出，2004年加入欧盟的国家获得了可观的收入收益。15年后，人均GDP平均比未加入欧盟的反事实情景高出30%以上。尽管新成员国的所有地区均从中受益，但受益程度存在差异。那些在加入前已与现有成员国价值链联系更为紧密的地区，其人均GDP的增幅比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高近10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与地理距离无关。此外，企业更容易获得长期融资的地区，其收益比其他地区高出近15个百分点（IMF，2024）。

同样，Grassi（2024）发现，如果未加入欧盟，2004年这一轮扩大的十个新成员国在2019年的人均GDP将低24%。与此同时，相同的合成控制方法并未识别出对2004年之前已加入欧盟的国家存在稳健的影响。此外，该分析还显示，在投资、消费、政府支出、进出口比重、就业率、外国直接投资以及监管指数等方面存在趋同现象（Grassi，2024）。

因此，现有研究对加入欧盟所带来收益的估计区间较为宽广：人均收入增幅从约5%（Boltho 和 Eichengreen，2008）到20%（Badinger，2005）、24%（Grassi，2024），直至30%（IMF，2024）。

三，实证方法与数据

合成控制法最早由 Abadie 和 Gardeazabal（2003）提出，用于估计巴斯克地区恐怖主义冲突的经济影响；随后 Abadie 等（2010）将其应用于分析总量干预措施的政策效果。此后，该方法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合成控制法特别适用于不存在任何单一单位能够提供理想对照对象的情形（Abadie，2021），以及研究时间序列波动性较低的情形（Abadie 和 Vives-i-Bastida，2022）。相较于比较案例研究、回归分析或时间序列分析，尤其是在估计影响少数大型单位的总体性干预效应时，该方法具有重要优势。比较案例研究的一个主要缺点在于对照单位的选择缺乏规范化标准，而合成控制方法则通过数据驱动的程序对对照单位的选择进行规范化处理（Abadie，2021）。与回归分析相比，合成控制法也可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King 和 Zeng，2006）：其将权重限制在0与1之间，能够直观展示处理组与对照组在处理前趋势上的相似性与差异（Abadie 等，2010），并明确各个比较单位在构建反事实情景中的贡献。相比之下，时间序列分析可能会受到其他影响结果变量的冲击以及处理前趋势时间区间任意选择的干扰。

合成控制法通过将研究对象的结果与基于预先设定标准选取的其他经济体所构建的反事实进行比较。使用多个相似经济体的加权平均，也有助于减轻其他国家特有冲击对分析结果的混淆效应。此外，该方法通过在同一年内比较加入欧盟的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隐性控制了年度固定效应。例如，全球金融危机可能会同时影响大多数经济体（包括加入欧盟的国家及其对照国

家），而合成控制法在特定年份内选择对照经济体，从而能够在不混入全球性混杂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识别加入欧盟本身的效应。

合成控制法为基于入盟前相似性这一预设标准选择对照单位提供了一套系统化的方法。该方法对所选时间区间的敏感性较低，并同时整合了经济体在入盟前的表现（国家特定因素）以及年度固定效应（全球性影响）。

我们采用欧盟以外的其他国家组合构建合成对照国，该国在加入欧盟前具备与候选成员国相似的经济特征。我们基于多项入盟前经济指标考察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包括美元口径的 GDP、人均 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以及人均实际 GDP 增长率。随后，将该“反事实”国家在未加入欧盟情景下的经济演变，与实际加入欧盟国家的经济表现进行比较。

更正式地说，我们观察若干国家（以 j 为索引）在多个时期（以 t 为索引）的表现。其中，第一个单位在时间 $T_0 + 1$ 加入欧盟（即接受“处理”）。其余国家则未加入欧盟（未接受“处理”）。我们的目标是估计欧盟入盟在入盟当年及其后若干年（ $T_0 + 1, \dots, T$ ）对人均 GDP 的影响。

欧盟入盟的影响通过潜在结果框架进行分析（Rubin, 1974）。 Y_{jt}^N 表示单位 j 在时间 t 未加入欧盟情况下所观察到的结果。 Y_{1t}^I 表示加入欧盟的国家（即“处理组”单位）在时间 t 所观察到的结果。对于处理组单位，我们关注其在未接受处理情况下的潜在结果（ Y_{1t}^N ），以及处理对处理组的影响：

$$\tau_t = Y_{1t}^I - Y_{1t}^N \quad (1)$$

对 Y_{1t}^N 的合成控制估计量是由 J 个未受处理单位构成的“供体池（donor pool）”结果的加权平均，

$$\hat{Y}_{1t}^N = \sum_{j=2}^{J+1} W_j Y_{jt} \quad (2)$$

其中 W_2, \dots, W_{J+1} 为非负权重，且其总和为 1，用以表示各未受处理观测值在所关注反事实估计中的贡献。权重的选择方式使得所得合成对照体在干预发生之前，在预测变量取值方面尽可能接近受影响单位（Abadie, 2021）。

具体而言，我们在入盟前的若干指标上进行匹配，包括以美元计的 GDP（经济规模）、以美元和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人均 GDP（发展水平），以及入盟前各年的人均实际 GDP 增长率（对 2004 年入盟国家，匹配期自 1995 年起；对 1995 年入盟国家，匹配期自 1990 年起）。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数据库¹，时间跨度为 1980–2023 年。

平均而言，每个国家的合成对照体由 104 个比较单位构成，单个比较单位的平均权重低于 1%。例如，波兰的合成对照体是由多个经济体加权平均而成，其中中国、赤道几内亚、印度、摩尔多瓦、沙特阿拉伯和乌克兰被赋予较高权重。匈牙利在海湾国家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份额相对较高。在奥地利的合成控制中，瑞士、阿联酋和挪威被赋予最大权重；而在芬兰的合成控制中，冰岛和瑞士被赋予最大权重。

¹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SPROLLS/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s>

该程序依托Abadie等（2011）开发的统计软件程序包实现。权重选取旨在使处理组经济体与对照组在预处理阶段的差异的均方根百分比误差（RMSPE）最小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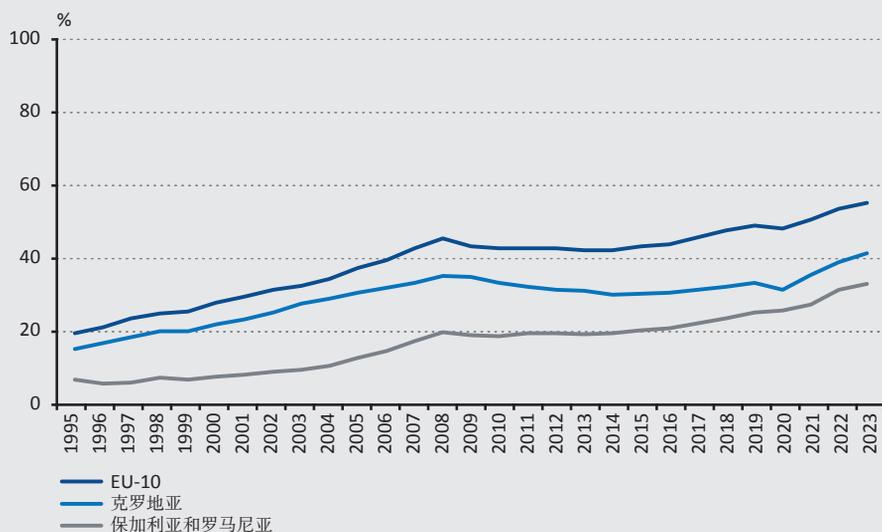
四，结果

4.1. 2004年及以后加入欧盟的国家

我们首先考察以名义美元计的人均收入，这是投资者在选择生产地点或出口商在国际竞争中最为关注的指标。我们也使用实际GDP指数重复了分析（见附录，图8）。

1995年EU-10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的人均GDP平均仅为德国的19%，只略高于当今欧盟周边经济体的平均水平（高加索、摩尔多瓦、南部和东部地中海地区、土耳其、乌克兰以及西巴尔干为14%）。这一比例在2003年迅速上升至32%，并在2023年达到55%（见图1）。典型（中位数）经济体的经历也大体相似。截至2023年，EU-10经济体的人均GDP水平差异较大，其中匈牙利和波兰约为德国的42%，而塞浦路斯和马耳他则达到德国的66%–73%。

图1：EU-10、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的人均GDP（占德国的百分比），1995–2023年



注：市场汇率。各国简单平均。

来源：IMF 2024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及作者计算。

2007年和2013年入盟的经济体同样经历了快速的收入趋同。2007–2023年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相对于德国的人均收入占比从17%提升至33%；而在2013–2023年期间，克罗地亚的人均GDP占比则由30%提高至41%。

与其他处于相似发展水平的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体之间观察到的收入趋同相比，这一表现尤为显著。合成控制分析表明，EU-10与德国之间观察到的平均23个百分点的趋同中，有6个百分点与新兴市场对照组共有，而另外17个百分点可被视为“欧盟入盟红利”（见图2；各国具体估计见附录，图9）。

随着入盟前景在2001–2002年前后逐渐明朗、流向EU-10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增加，入盟红利已开始显现。与此同时，许多对照新兴市场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趋同速度明显放缓，导致EU-10与对照组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2008–2009年危机虽造成冲击，并使欧盟入盟红利在2012年短暂地在统计上不显著，但随后增长率又回到高于合成对照组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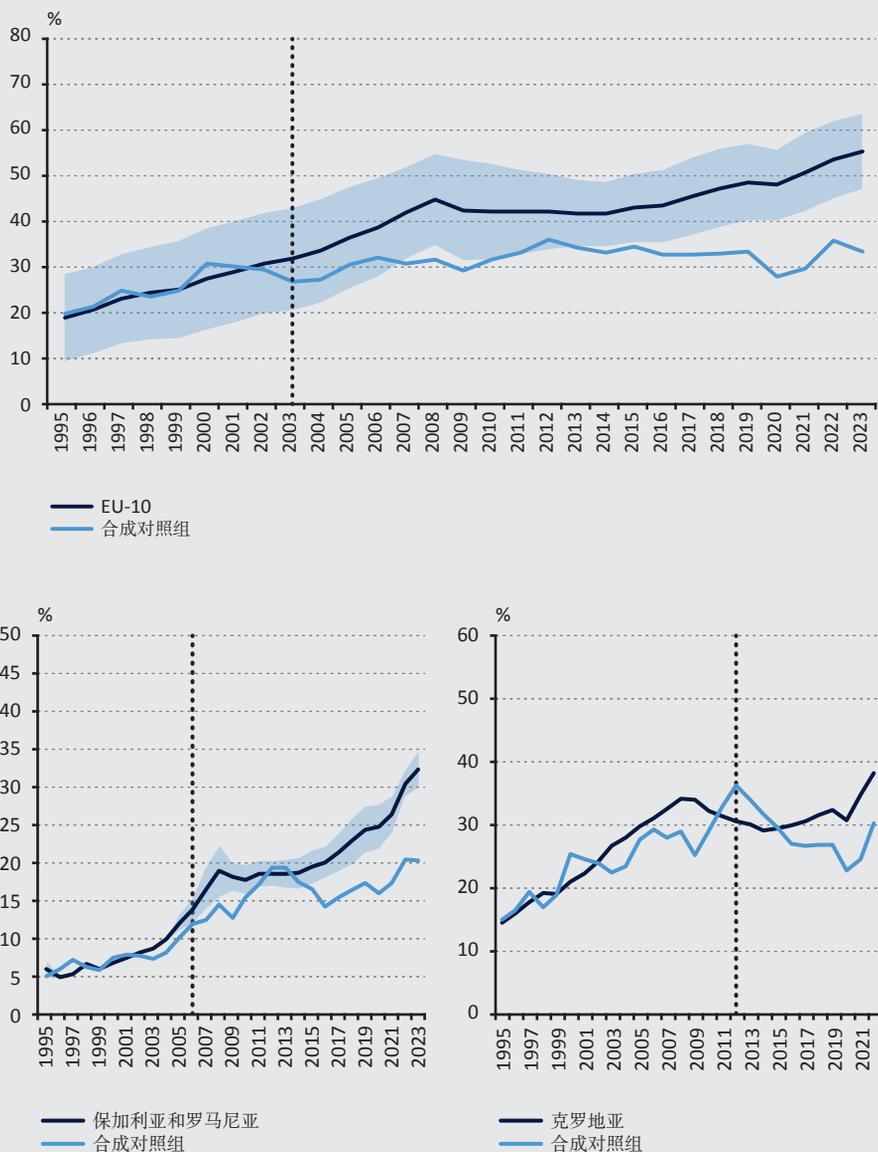
从实际人均GDP增长的角度看，这一模式也非常相似。EU-10经济体同样跑赢其合成对照组；全球金融危机削弱了最初的正向效应，但此后该效应又强劲地重新显现。

“欧盟入盟红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出口占GDP比重的强劲增长。随着EU-10经济体深度融入欧洲及全球供应链，其出口占GDP的比率从1999年的51%上升至2003年的52%，并在2023年进一步提高至83%。出口占GDP的比重从罗马尼亚的40%到马耳他的131%不等。相比之下，对照经济体在过去20年中的出口占GDP比重总体保持平稳（见图3）。

EU-10中的大多数经济体以及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在20世纪90年代与欧盟签署并批准了自由贸易协定。入盟国家在降低关税方面获得了比欧盟成员国更长的过渡期，且在突发进口对本国产业造成损害时，入盟经济体还可以重新征收关税。

在这一方面，入盟前的出口占GDP比重也仅略高于当今欧盟周边经济体的平均水平；截至2023年，该平均水平为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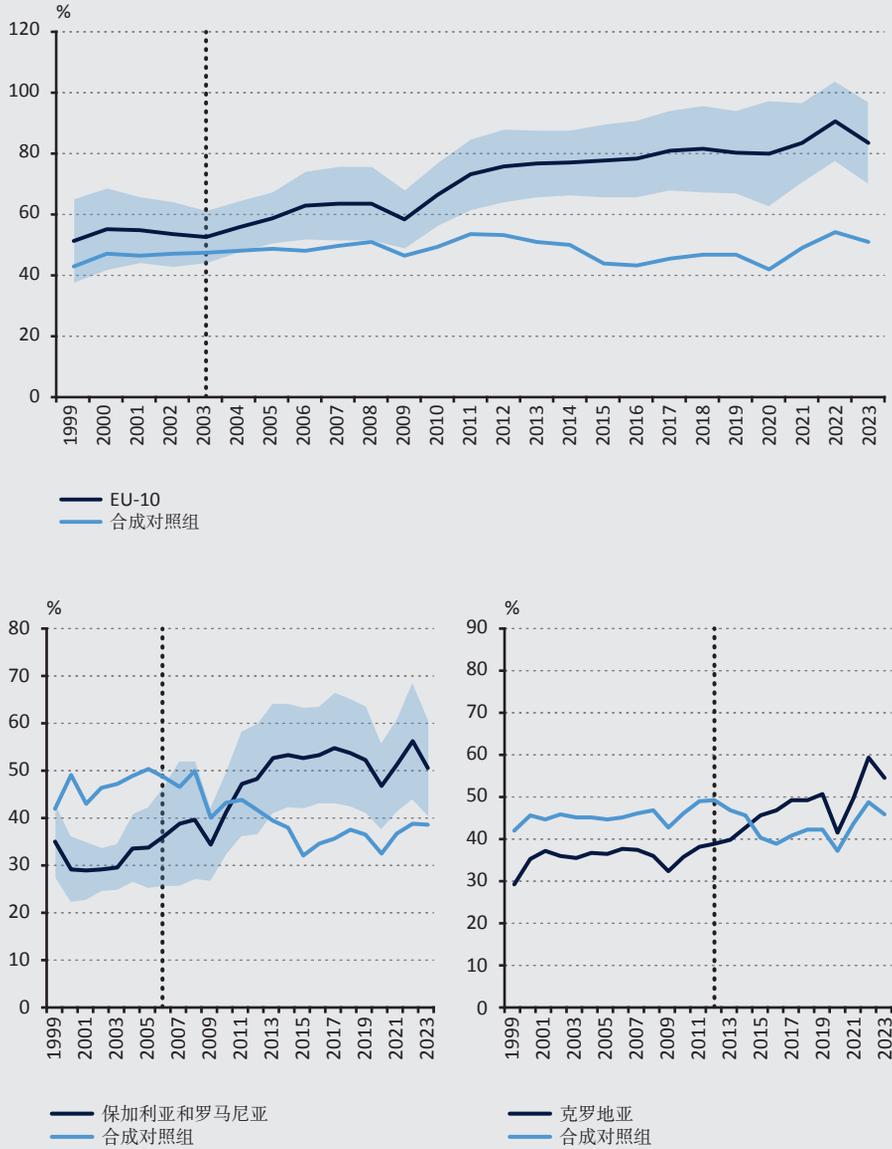
图2：EU-10、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的人均GDP（占德国的百分比）



注：显示95%的置信区间。合成对照基于以名义美元计的GDP和人均GDP、以PPP美元计的人均GDP以及实际人均GDP增速。各国简单平均。虚线表示入盟前一年。

来源：IMF 2024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及作者计算。

图3：EU-10、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出口占GDP比重



注：显示95%的置信区间。合成对照基于以名义美元计的GDP和人均GDP、以PPP美元计的人均GDP以及实际人均GDP增速。虚线表示入盟前一年。

来源：IMF 2024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及作者计算。

除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作为融资来源和技术溢出的渠道）带来的收益，以及来自外国直接投资和欧盟相融基金的额外融资（IMF，2024）之外，2004年加入欧盟的一组国家还受益于广泛的改革举措。例如，匈牙利下调了企业所得税税率，并通过调整增值税扩大税基，减少逃税行为、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斯洛伐克引入了统一税率并大幅简化了税制。波兰政府强化了反垄断机构的权力，并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斯洛文尼亚设立了独立的竞争监管机构，并推进了电信和工业领域的自由化。在加入欧盟前的10年里，入盟经济体在国内金融、对外融资、产品市场以及贸易自由化等领域的改革进展显著快于全球平均水平；而在入盟后的10年中，仅产品市场改革的推进速度比全球平均水平明显更快（IMF，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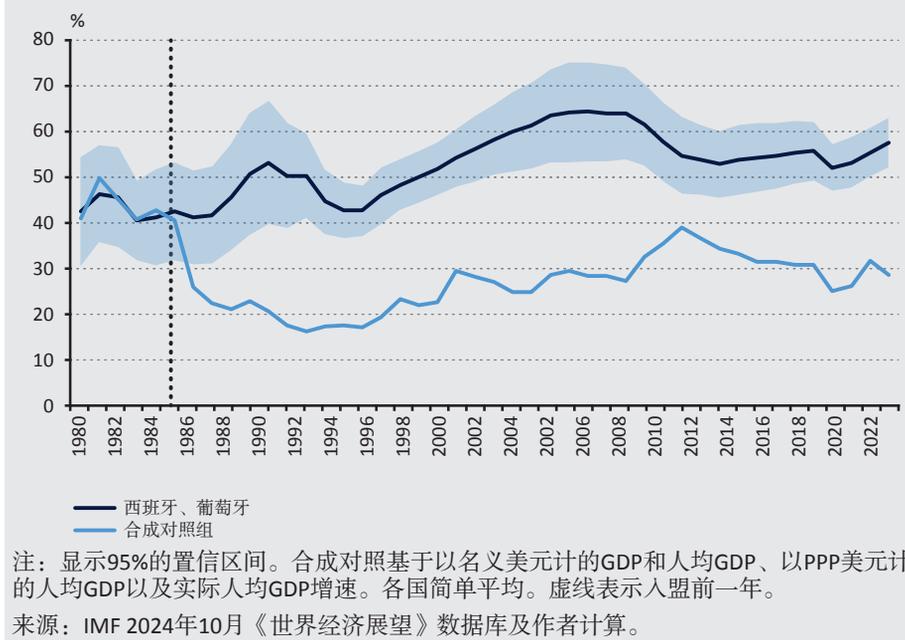
与早期的欧盟扩员不同，2004年的扩员之前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准备过程，涉及入盟国以及欧盟自身的重大制度性变革（见 Bache 等，2011；Campos 和 Coricelli，2002）。因此，2004年的扩员首次在正式入盟之前，有意识地努力确保达到充分的制度融合程度（Bruszt 和 Campos，2017；Campos 等，2019）。

4.2. 1986年加入欧盟的国家

西班牙和葡萄牙于1986年加入欧盟，当时其收入水平约为德国的40%。尽管面临较为突出的生产率挑战（见 de Souza 和 Diaz，2024），两国仍在随后20年中实现了相对于德国约15个百分点的人均GDP趋同。同期，其合成对照组的生长乏力，这表明存在显著的入盟红利（见图4；各国具体估计见附录，图9）。

在这一情况下，估计得到的超额收益以名义美元计时高于以实际指标计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几十年来可比新兴市场更为普遍的经验：尽管在实际指标上可以观察到与高收入经济体的趋同，但在按市场汇率计时，这种趋同则较弱甚至并不存在，因为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经历了本币贬值（见 EBRD，2019）。特别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合成对照组中包含了若干拉丁美洲和中东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或1986年油价暴跌后出现了货币贬值。相比之下，加入欧盟可能通过将西班牙和葡萄牙纳入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提供结构性基金和相融基金，并促进其与既有成员国之间的投资和贸易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免受外源性冲击的影响（见附录，图8和图9）。欧盟入盟还使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希腊）拥有了一种在反事实情形下很可能难以实现的更为坚挺的本币。

图4：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人均GDP（占德国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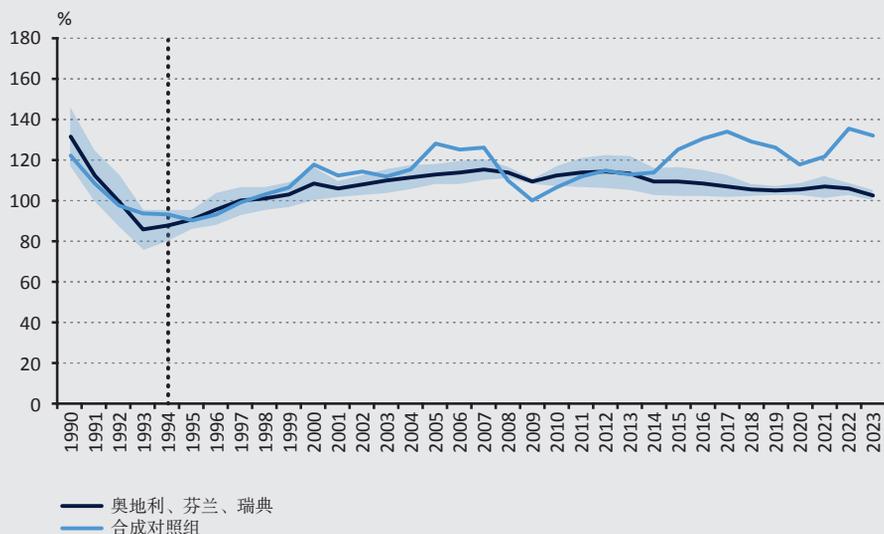


由于数据限制，难以对希腊开展完全可比的分析。如果基于样本观测期较短的预处理序列进行尝试，其结果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结论大体相似。不过，该超额表现的大部分在201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被消解，这与 Campos 等（2019）的研究结果一致。

4.3. 1995年加入欧盟的国家

对1995年加入欧盟的奥地利、芬兰和瑞典而言，入盟红利缺乏稳健证据。在1994–2023年期间，奥地利、芬兰和瑞典的人均GDP表现优于德国，但其合成对照组所指示的趋同速度更快（见图5；各国具体估计见附录，图9）。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合成对照组的供体池中包含了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这些国家因参与单一市场而获益。将这些国家排除在合成对照组之外，表明这些经济体同样存在显著的入盟红利，尽管该效应仅在长期内可被察觉（见附录，图10；亦与 Campos 等，2022 的研究结论一致）。入盟红利估计值较小且稳健性较弱，亦可能反映了这些国家在人均GDP和制度方面的趋同边际空间有限，以及当时欧盟单一市场规模相对较小（IMF，2024）。

图5：奥地利、芬兰和瑞典的人均GDP（占德国的百分比）



注：显示95%的置信区间。合成对照组基于以名义美元计的GDP和人均GDP、以PPP美元计的人均GDP以及实际人均GDP增速。各国简单平均。虚线表示入盟前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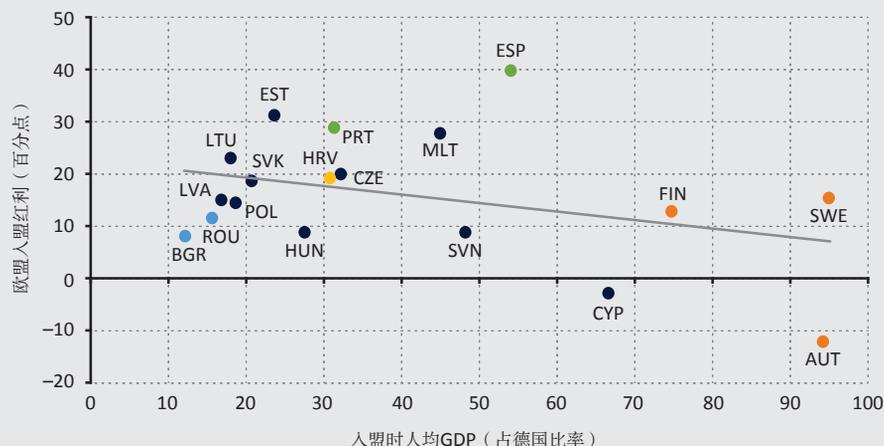
来源：IMF 2024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及作者计算。

4.4. 收入差距越大，入盟红利越高

比较不同年份加入欧盟的国家所获得的入盟红利可以发现，长期来看，收入水平较低、制度相对薄弱的经济体往往享有更大的欧盟入盟红利（见图6；在将奥地利、芬兰和瑞典的入盟红利备择估计值纳入分析，或将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从供体池中剔除的情况下，这一模式依然稳健）。估计结果显示，爱沙尼亚和葡萄牙的入盟红利尤为显著，这两国加入欧盟时的人均GDP分别约为德国的23%和31%。相比之下，加入欧盟时人均GDP约为德国的67%–95%的奥地利、塞浦路斯、芬兰和瑞典，其入盟红利相对较低。这种梯度似乎比 Campos 等（2019）的研究所暗示的更为明显；该研究考察了为期10年的入盟收益，发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获得的收益最大，而希腊、瑞典、芬兰、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收益则要有限得多。图6（展示了20年期的收益）表明，斯洛伐克的收益相对较小，低于 Campos 等（2019）的结果；该研究考察的是10年期的入盟收益，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明显放缓（见附图9）。

对于与欧盟其他成员在人均GDP水平上差距更大的国家而言，其获得的收益更大，这与一种观察结果相一致：当在收入和制度方面存在可供制度套利空间时，经济联盟最为有益（EBRD, 2012）。例如，收入套利可以通过加强经济一体化来实现：低收入经济体承接低成本组装环节，受益于高收入经济体开发的制造设计以及技术转移。与收入水平不同，初期贸易开放度似乎与估算的入盟红利并不相关。

图6：入盟红利与收入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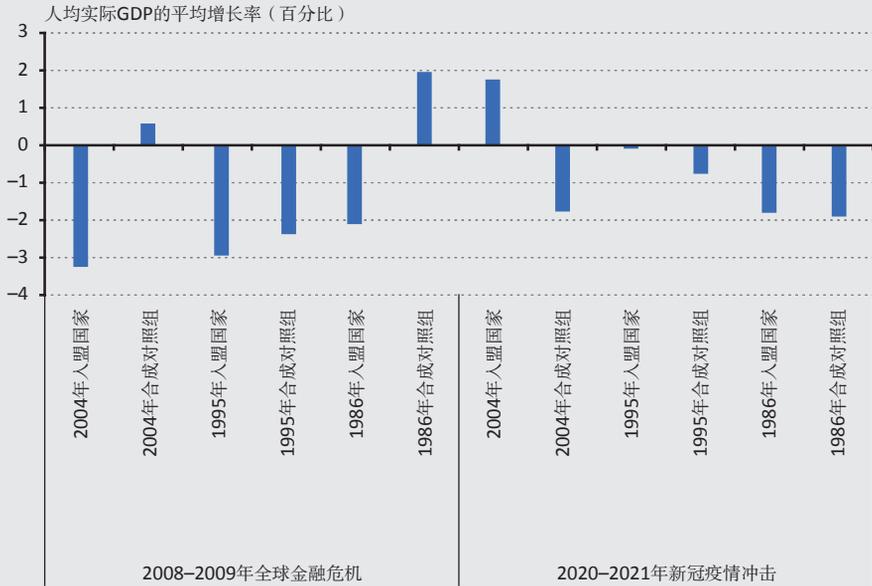
注：不同颜色表示不同年份加入欧盟的国家。入盟红利基于入盟后20年的数据计算；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则使用最新可得数据。

来源：IMF 2024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及作者计算。

4.5. 对冲击的抵御能力

合成控制法将研究对象国家与同一时期内具有相似特征的经济体进行匹配，从而反映了共性冲击的影响。尽管如此，加入欧盟也可能在长期内影响经济体对冲击的承受能力。如图7所示，在各次欧盟扩员中，成为欧盟成员的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均大于其合成对照组；危机削弱了估计得到的入盟红利规模，这可能反映了在更加开放、融合程度更高的经济体中，冲击传导更为强烈。另一方面，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些经济体人均GDP的平均降幅较小，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财政刺激计划相较于合成对照组更为强劲。

图7：全球金融危机与疫情的影响：欧盟成员国与合成对照组对比



注：年均增长率。

来源：IMF 2024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及作者计算。

五， 结论

基于合成控制方法，我们发现，1986年至2013年间加入欧盟的国家中，许多（但并非全部）从欧盟一体化中获得了显著收益。具体而言，我们发现，2004年入盟国家的欧盟入盟红利为17个百分点，2007年入盟国家为11个百分点，2013年入盟国家为20个百分点；相比之下，1986年入盟国家的入盟红利为33个百分点。既有的欧盟成员国并未因此受损，事实上，还可能从欧盟扩员中获益（Grassi, 2024; IMF, 2024）。

总体而言，我们的结果表明，在入盟时收入水平较低、制度较为薄弱的经济体，获得了显著且持久的额外入盟红利；而对于入盟时收入较高、制度较强的经济体则未呈现此类现象。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考察高收入、制度更为先进的经济体通过其他渠道从成员资格中获益的可能性，包括商品和服务单一市场的多种制度特征。

总体来看，如果入盟带来的趋同速率的提升在收入差距和制度差距较大的情况下最为显著，这意味着现有欧盟成员国的边际趋同空间有限，而通过纳入欧盟邻近地区所蕴含的潜力则相当可观。

欧盟邻里地区（高加索地区、摩尔多瓦、南部和东部地中海地区、土耳其、乌克兰以及西巴尔干地区）的人均GDP水平介于德国的约10%（乌克兰）至24%（土耳其）之间。就摩尔多瓦和乌克兰而言，这一水平大体相当

于保加利亚入盟时的水平；而土耳其则接近爱沙尼亚或斯洛伐克的水平，尽管其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基于历史经验，这一结果表明欧盟入盟所带来的潜在红利可能达到10至20个百分点。

参考文献

- Abadie, A. (2021): *Using Synthetic Controls: Feasibility, Data Requirements, and Methodological Aspects*. (《合成控制法的应用：可行性、数据要求与方法论问题》)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9(2): 391–425. <https://doi.org/10.1257/jel.20191450>
- Abadie, A. – Diamond, A. – Hainmueller, J. (2010):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 for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California’s Tobacco Control Program*. (《用于比较案例研究的合成控制方法：对加利福尼亚州烟草控制计划效果的估计》)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05(490): 493–505. <https://doi.org/10.1198/jasa.2009.ap08746>
- Abadie, A. – Diamond, A. – Hainmueller, J. (2011): *Synth: An R Package for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 in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Synth：用于比较案例研究的合成控制方法的R包》) *Journal of Statistical Software*, 42(13): 1–17. <https://doi.org/10.18637/jss.v042.i13>
- Abadie, A. – Gardeazabal, J. (2003): *The economic costs of conflict: A case study of the Basque Country*. (《冲突的经济成本：巴斯克地区的案例研究》)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1): 113–132. <https://doi.org/10.1257/000282803321455188>
- Abadie, A. – Vives-i-Bastida, J. (2022): *Synthetic Controls in Action*. (《合成控制法的实际应用》) *ArXiv Preprint ArXiv: 2203.06279*. <https://doi.org/10.48550/arXiv.2203.06279>
- Bache, I. – George, S. – Bulmer, S. (2011):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Union*. (《欧盟政治》)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dinger, H. (2005): *Growth effect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Evidence from the EU member states*. (《经济一体化的增长效应：来自欧盟成员国的证据》)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41(1): 50–78. <https://doi.org/10.1007/s10290-005-0015-y>
- Baldwin, R.E. – Seghezza, E. (1996): *Growth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Towards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增长与欧洲一体化：迈向实证评估》)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1393. <https://cepr.org/publications/dp1393>
- Ben-David, D. (1993): *Equalizing exchange: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come convergence*. (《均等化交换：贸易自由化与收入趋同》)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3): 653–679. <https://doi.org/10.2307/2118404>
- Ben-David, D. (1996): *Trade and convergence among countries*. (《国家间的贸易与趋同》)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0(3–4): 279–298. [https://doi.org/10.1016/0022-1996\(95\)01405-5](https://doi.org/10.1016/0022-1996(95)01405-5)

- Boltho, A. – Eichengreen, B. (2008): *The Economic Impac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欧洲一体化的经济影响》)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6820. <https://cepr.org/publications/dp6820>
- Bruszt, L. – Campos, N. (2017): *State Capacity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Evidence from the Eastern Enlargement*. (《国家能力与经济一体化：来自东欧扩大的实证研究》) EUI RSCAS Working Paper No. 2017/52. <https://hdl.handle.net/1814/48387>
- Campos, N. – Coricelli, F. (2002): *Growth in transition: What we know, what we don't, and what we should*. (《转型中的增长：我们已知的、未知的以及应当了解的》)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0(3): 793–836. <https://doi.org/10.1257/002205102760273797>
- Campos, N. – Coricelli, F. – Franceschi, E. (2022):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Europe: Synthetic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Evidence from the 1995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制度一体化与欧洲生产率增长：基于欧盟1995年扩员的合成双重差分证据》)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42, 104014. <https://doi.org/10.1016/j.euroecorev.2021.104014>
- Campos, N.F. – Coricelli, F. – Moretti, L. (2019):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urope*. (《欧洲的制度一体化与经济增长》)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03(1): 88–104. <https://doi.org/10.1016/j.jmoneco.2018.08.001>
- Crespo Cuaresma, J. – Ritzberger-Grünwald, D. – Silgoner, M.A. (2008): *Growth, convergence and EU membership*. (《增长、趋同与欧盟成员资格》) *Applied Economics*, 40(5): 643–656. <https://doi.org/10.1080/00036840600749524>
- de Souza, L.V. – Diaz, D. (2024): *Growth and Convergence in Portugal: Historical and Policy Experiences at National and Metropolitan Level*. (《葡萄牙的增长与趋同：国家与大都市层面的历史与政策经验》) *Notas Económicas*, No. 58(2024): 37–63. https://doi.org/10.14195/2183-203X_58_2
- EBRD (2012): *Integration across borders*. (《跨境融合》) *Transition Report 2012*. https://www.ebrd.com/content/dam/ebd_dxp/assets/pdfs/office-of-the-chief-economist/transition-report-archive/transition-report-2012/Transition-Report-2012-Integration-Across-Borders-English.pdf
- EBRD (2019): *Eight things you should know about middle-income transitions*. (《关于中等收入转型你应该知道的八件事》) EBRD, London. https://www.ebrd.com/content/dam/ebd_dxp/assets/pdfs/office-of-the-chief-economist/special-reports/middle-income-transition/eight-things-you-should-know-about-middle-income-transitions/EBRD-Middle-Income-Transitions.pdf
- EBRD (2024): *Taming inflation*. (《治理通货膨胀》) *Regional Economic Prospects*, May 2024. <https://www.ebrd.com/rep-may-2024.pdf>
- Grassi, B. (2024): *The EU miracle: When 75 million reach high income*. (《欧盟奇迹：当7500万人迈入高收入行列》) CEPR Discussion Paper 19114. <https://cepr.org/publications/dp19114>

- Henrekson, M. – Torstensson, J. – Torstensson, R. (1997): *Growth effect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欧洲一体化的增长效应》)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1(8): 1537–1557. [https://doi.org/10.1016/S0014-2921\(97\)00063-9](https://doi.org/10.1016/S0014-2921(97)00063-9)
- IMF (2024): *A recovery short of Europe's full potential*. (《未能完全发挥欧洲潜力的复苏》) In: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Europe, October 2024*. <https://doi.org/10.5089/9798400287312.086>
- King, G. – Zeng, L. (2006): *The Dangers of Extreme Counterfactuals*. (《极端反事实的风险》) *Political Analysis*, 14(2): 131–159. <https://doi.org/10.1093/pan/mpj004>
- Rubin, D.B. (1974): *Estimating causal effects of treatments in randomized and nonrandomized studies*. (《在随机和非随机研究中估计干预措施的因果效应》)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66(5): 688–701. <https://doi.org/10.1037/h0037350>
- Slaughter, M. (2001):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per capita income convergence: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nalysis*. (《贸易自由化与人均收入趋同：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分析》)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5(1): 203–228. [https://doi.org/10.1016/S0022-1996\(00\)00087-8](https://doi.org/10.1016/S0022-1996(00)00087-8)
- Szapáry, G. – Vonnák, B. (2024): *The Impact of Monetary Policy Institutional Decisions on Convergen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货币政策制度性决策对中东欧国家趋同的影响》)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view*, 23(4): 120–152. <https://doi.org/10.33893/FER.23.4.120>

附录

图8：实际GDP：合成控制估计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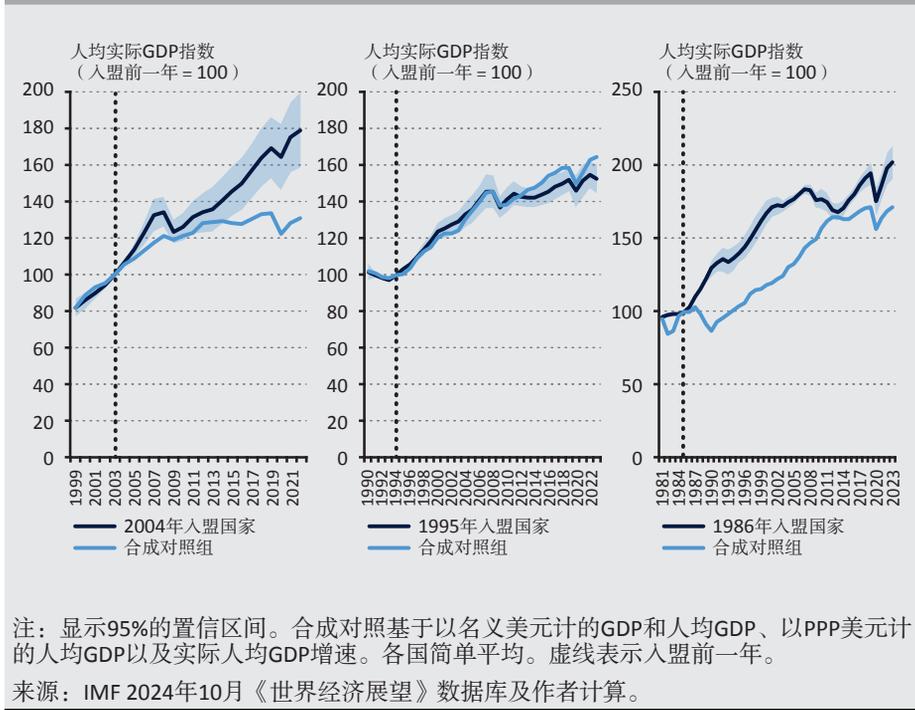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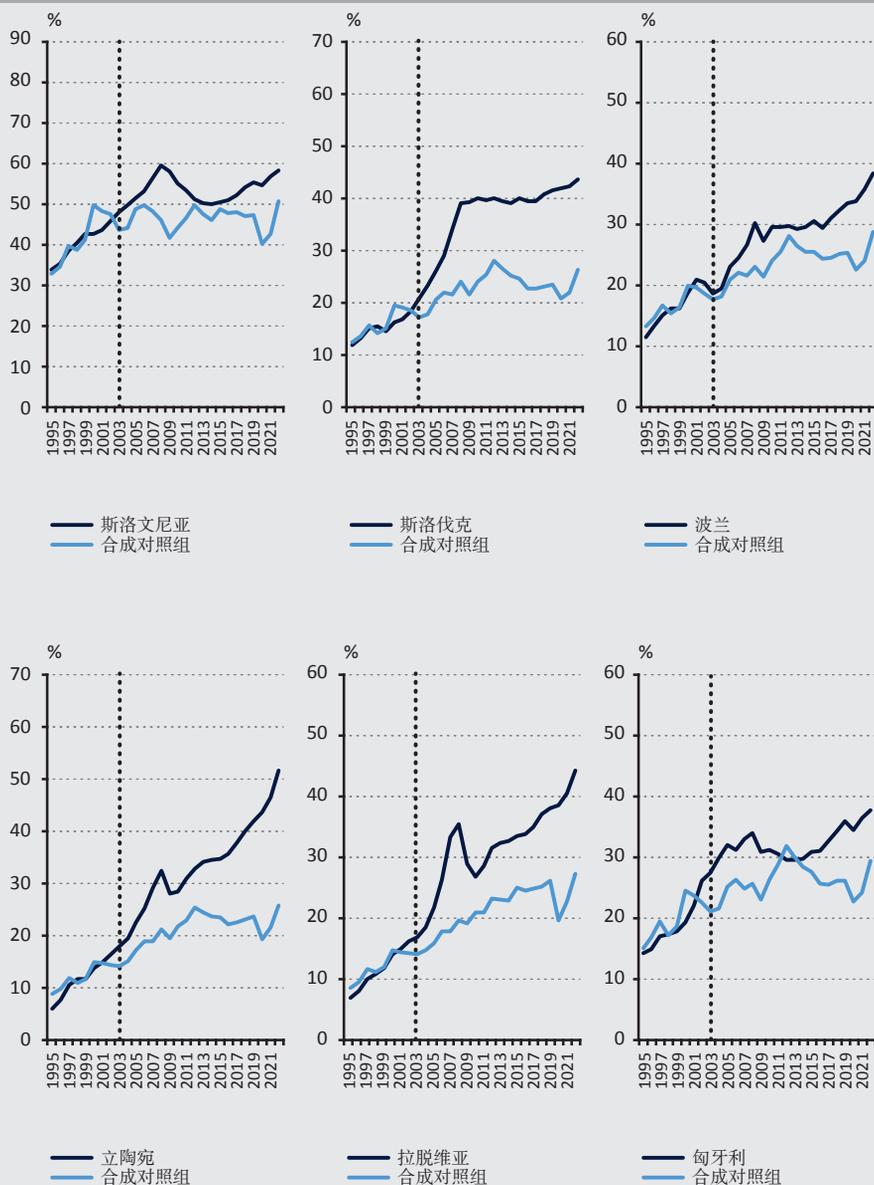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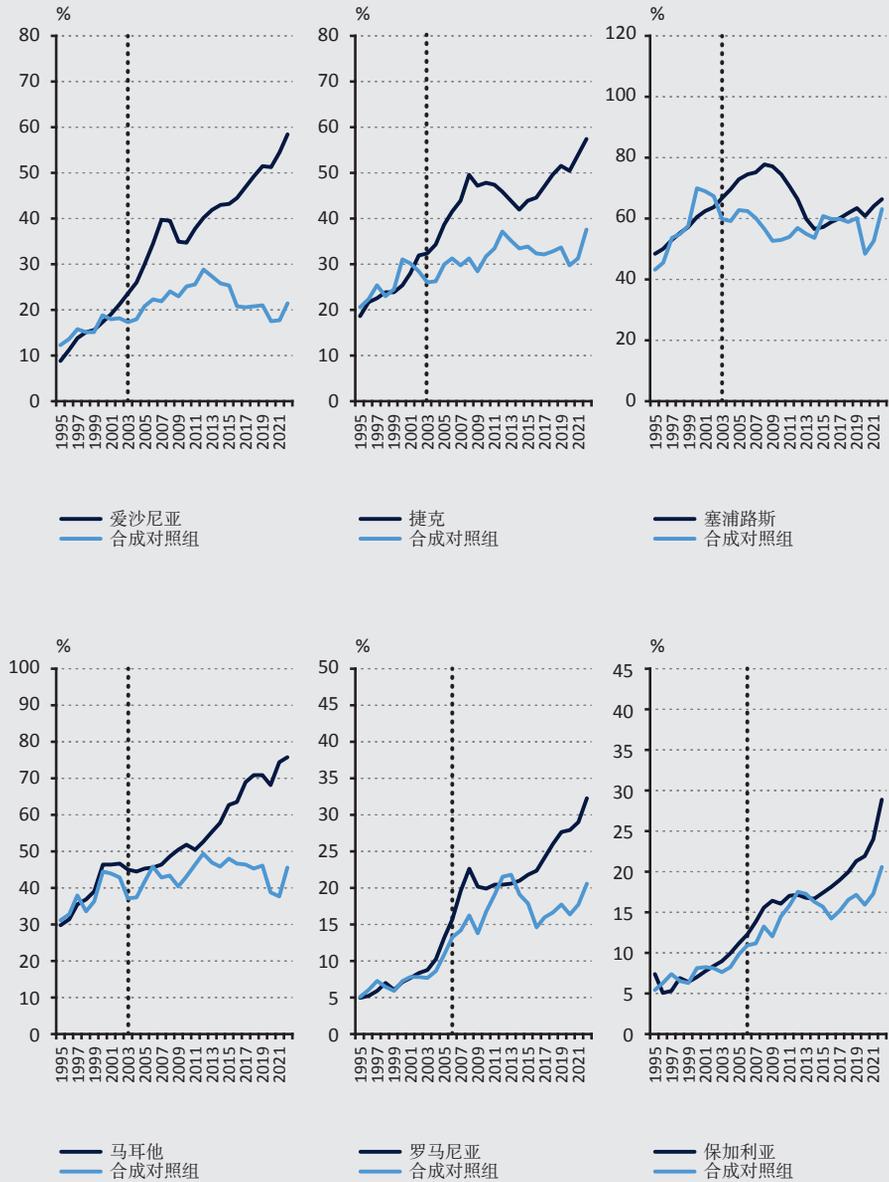
图9：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国别/个体经济体的合成控制估计结果



注：合成对照基于以名义美元计的GDP和人均GDP、以PPP美元计的人均GDP以及实际人均GDP增速。虚线表示入盟前一年。

来源：IMF 2024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及作者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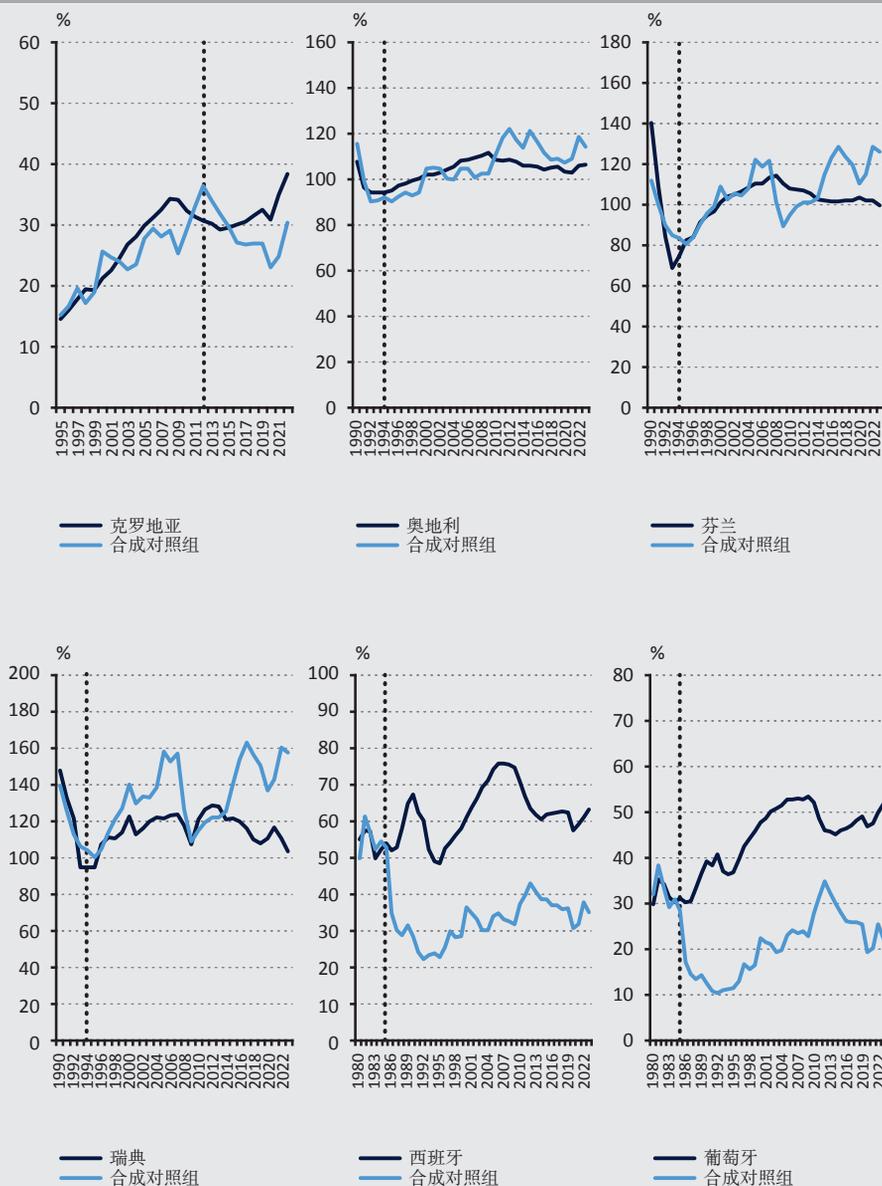
图9：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国别/个体经济体的合成控制估计结果



注：合成对照基于以名义美元计的GDP和人均GDP、以PPP美元计的人均GDP以及实际人均GDP增速。虚线表示入盟前一年。

来源：IMF 2024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及作者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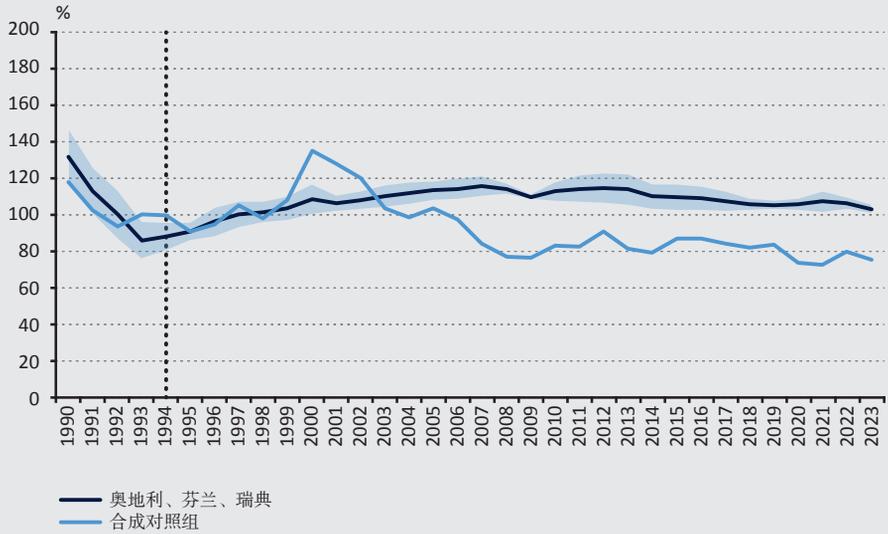
图9：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国别/个体经济体的合成控制估计结果



注：合成对照基于以名义美元计的GDP和人均GDP、以PPP美元计的人均GDP以及实际人均GDP增速。虚线表示入盟前一年。

来源：IMF 2024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及作者计算。

图10：奥地利、芬兰和瑞典人均GDP占德国的比例（合成对照组供体池中不包括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



注：显示95%的置信区间。合成对照基于以名义美元计的GDP和人均GDP、以PPP美元计的人均GDP以及实际人均GDP增速。各国简单平均。虚线表示入盟前一年。

来源：IMF 2024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及作者计算。